

“问题癖”的理性外化与延展——论胡适的现代戏剧观（上）

—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是从对“问题”的关注进入到对“问题剧”艺术的关注的。在“推倒偶像”、“重估一切价值”的五四时代，深受欧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已基本形成系统的西方现代哲学观和价值观的胡适，就其社会思想而言，是启蒙主义的，强调破除迷信，开启民智，以反传统的姿态推进文化的更新和革命；就方法论而言，是实验主义的，师从美国哲学家杜威获得的实验主义方法，使胡适格外注重科学的怀疑精神和求实精神。这种独特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构成了胡适思想体系的核心。他的崇尚科学，摈弃迷信，主张独立思考，注重求实精神，崇尚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强调自由平等，尊重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解放，乃至高倡思想言论自由、恋爱婚姻自由等等，都是体现着他的哲学和方法论的蕴涵，体现着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家、文艺家的特征，而他的戏剧观则是其“问题癖”的理性外化与延展。

—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它的目的是将中国人从业已僵化了的以封建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桎梏中解放出来，改造国民性，以拯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积弱不振的祖国。因此它不能不以对旧的一切的怀疑和批判为起点，不能不以“知耻近乎勇”的态度学习西方文化，从而获取解剖各种问题的思想利器。无疑，担负破旧立新文化使命的先驱者们，在面对封建思想营垒时，在清算旧道德、旧文化的积弊时，所取的斗争姿态和方式是不同的。从彻底地反封建的角度去看，胡适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

实验方法，堪称斗争的利器。事实上，在对封建文化轰轰烈烈的冲击中，它也确实显示出了锐不可挡的力量。

和陈独秀的革新“精神界之文学”的思考、李大钊的“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的倡导、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呐喊相比，胡适似乎更注重对封建社会诸多问题及其复杂精神现象的透视和批判，这与他所热衷的实验主义思想方法是一致的，同时，也使这位敏感的启蒙思想家五四时期的关于新文化的见解站立在了较为科学的基石上。无疑，实验的方法促动胡适去怀疑，而怀疑使他努力去发现问题，而发现了问题又使他极力寻求解决的办法，如此有序地循环，造就了五四时期活跃的思想界战士——胡适，也更为精粹地锤炼了胡适整个的科学世界观。

胡适对“问题”所有的是近乎“恋物癖”似的兴趣。他说：“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仪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无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启蒙主义的社会思想和世界文化的眼光，使胡适以怀疑精神和求实的品格，要求人们去自觉地发现社会问题，正视社会问题，从而承担起改造社会的重任。正是由于“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对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问题，大到孔教与礼教、文学改革、教育改良、戏剧改良，小到国语统一、女子解放、贞操、婚姻、父子，都热心参与，积极发表意见，俨然是社会问题方面的“首席专家”和“职业发言人”。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与李大钊展开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同年12月，胡适又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思想文化纲领。二十年代初，胡适和他的学生顾颉刚讨论古书的辨伪问题，引导顾颉刚“古史辨”的研究，并通过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学说。直到三十年代创办《独立评论》时，胡适仍在表示：期望作者们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

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即“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

尽管胡适的主张与其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但是，胡适对问题的关注可谓始终如一。按照胡适的理解，怀疑和批判是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精髓，因而，胡适把发现“问题”作为思想解放的第一步。在胡适看来，发现问题，才会谋求解决，谋求解决便需要工具，认识工具，正确地运用工具才会走向成功。正是从这种严谨的逻辑思路出发，胡适对当时思想文化界存在的偏误提出了严肃地批评：“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依据胡适的观点，“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胡适于此对“主义”的轻视，显然有其偏颇之处，反映了这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轻视。但是，他强调研究问题的重要却又有其科学与合理之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十分注重“学理的行动性”的人，把“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的文化行动哲学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说：“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坚持通过科学的实验方法追求启蒙主义的目标，是胡适在新文化建设中特别强调的。他反对仅仅追求理论的新奇和玄妙，而断定“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如果不能这样做，就无法真正把握社会的真谛。

笔者之所以用了如此多的篇幅来分析胡适的哲学思想、实验方法，特别是胡适对于“问题”的重视，并不是想描述他的“问题癖”，或说明他在社会观念上对社会问题的个人偏好。而是探究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一个富有改革激情的文艺家，胡适何以会对中国问题剧情有独钟，作出这种选择的哲学背景和

文化动机是什么，以及在胡适眼里，问题的研究、发现和表现对新兴的戏剧艺术具有怎样的意义。

二

显然，胡适对自己对于问题的执着思考是十分满意的，也是颇为自负的。他觉得自己把握住了社会改革的关键，他期望社会能形成关注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的氛围，也期望借助戏剧这一宣传手段，唤起民心，最终使人们通过对问题的透视和解决，实现思想的解放，求得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因此，当胡适由哲学的“问题”的思考进入到艺术的“问题”的思考时，当他试图建设超越传统的全新的戏剧理想时，他毫不犹豫地将易卜生问题戏剧作为现代戏剧思想艺术的典范来褒奖、鼓吹，并以“问题的戏剧”作为取代传统旧戏曲的最为精当的戏剧形态。由此，胡适进入了为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奠定理论基业的历史空间。

美国学者格里德认为：胡适所说的“易卜生主义”，完全是以易卜生早期的“社会问题剧”为基础的，“因为他发现从《玩偶之家》、《人民公敌》这类作品中更容易得到他所寻觅的社会性启发。”——正是从易卜生的作品中，胡适看到了在文化革命的时代，戏剧的理想性形态，即“思想戏剧”、“问题戏剧”的形态。胡适说到底不是具有深厚文艺美学根底的文学艺术大师，而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这使他不能不下意识地用思想和哲学的眼光，站在思想和哲学的视角上去考察文艺（包括戏剧），从而赋予戏剧以改造社会的责任。因而，对“责任”的强调成为胡适现代戏剧观最为显著的特征。

胡适对“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旧文学很不齿，也不赞赏唯美的或浪漫的艺术，在胡适看来，戏剧不是用来消遣娱乐的奢侈品，而是“社会责任文学的榜样”。格里德曾精辟地指出：在胡适眼里，“文学应当起某种社会作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它都不应该是一种描写个人隐秘趣味的私人艺术。胡适主张，新文学必须要关心当前紧迫的社会与文化问题——贫穷、工人、黄包车夫、小商贩等人的生活条件，家庭制的解体，新型教育和东西文化冲突问题，等等。”——戏剧作为面对大众的形象的艺术，更是如此。戏剧家对社会有着自己的职责，它使剧作家通过对现实的新的认识，寻找新颖的主题，

表现社会问题内在的根源。胡适认为，易卜生最大的成功就在于，“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心动，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象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

这种强调“责任”的戏剧观，是功利的。显然它是胡适实用主义社会价值观的体现，与他的政治激情、与他改造国家的宏愿是相匹配的。当胡适追求他的新国民、新社会的理想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文化与文学上的抑郁，“他对古代经典中的‘死文字’并无眷恋之情，对许多由这种文字所支撑的传统亦无钟爱之感。”——因而，他打碎旧剧的营垒，是为了建设与他的“新社会”的理想相一致的体现着“责任”的功利的“新戏剧”，因此他注重“戏剧的改良问题”，并以为这是新文化与旧文化严重的分歧之一——；他强调戏剧进化，说：“杂剧之变为南戏传奇，在体裁一方面虽然不如元代的谨严，但因为体裁更自由，故于写生表情一方面实在大有进步，可以算得是戏剧史的一种进化。”——正是凭依戏剧观上的富有创造性的这些点，胡适意欲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的文学”、活的戏剧，“人的文学”、人的戏剧。——

由于戏剧被胡适视为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因此，他要求“新戏剧”摒弃庸俗无聊的“文明戏”恶习，关注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成长，真实地描写社会人生。这是写实精神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写实的戏剧观无疑是较为前卫的，也是富有挑战性的，胡适写实的戏剧观是其现代戏剧思想的重要体现，对中国早期戏剧具有特殊意义。

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就阅读了大量西方写实主义的戏剧作品。1915年，他在给《甲寅》杂志社的信中写到：“近五十年来，欧洲文字最有势力者，阙唯戏剧，而诗与小说皆退居第二流。名家如挪威之易卜生，德之霍普特曼、法之白里欧、瑞士之斯特林堡，英之萧伯纳及高尔斯华绥、比之梅特林克，皆以剧著声全世界。今吾国剧界，正当过渡时期，需世界名著为范本，颇思译易卜生之《玩偶之家》或《国民公敌》，惟何时脱稿，尚未可料。”——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此例举的“名家”并认为要以之作为“范本”的戏剧家，绝大多数都是欧洲问题剧作家，都是写实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可见，胡适对写实戏剧的青睐由来已久。

由于看重写实戏剧，胡适对易卜生推崇备至，从他的剧作中获得了强烈共鸣。在《我的信仰》中，胡适曾回顾了留美时代的生活，他说：“我读易卜生（Ibsen）、莫黎（John Morley）和赫胥黎诸氏的著作，教我思考诚实与发言诚实的重要。我读过易卜生所有的戏剧，特别爱看《人民之敌》”。__1918年，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又指出：“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他认为“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__胡适赞赏易卜生对当时病态的挪威社会的揭露，指出易卜生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家庭的“四种大恶德”和社会上的“三种大势力”，作为勇敢的反叛者，易卜生将“自私自利”、“倚赖性、奴隶性”、“假道德、装腔作戏”、“怯懦没有胆子”及“法律”、“宗教”、“道德”悉数拿来作为批判、攻击的对象，显示了直面社会人生的胆略。毫无疑问，今天中国的戏剧也应当象易卜生戏剧一样“睁开眼来看世间”，以适应现代社会变革的历史要求。胡适对易卜生戏剧从未报以纯粹的观赏态度，而是始终与中国现实的社会联系起来而加以分析的。胡适说：“据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男少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__胡适认为，新戏剧只要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就要对这种种虚伪的、黑暗的情形进行揭露和抨击。

由于看重写实戏剧，胡适谴责“说谎的文学”，认为：不敢正视和不敢揭露“天下的悲剧惨剧”，不敢“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惨酷”，凭空杜撰美满结局，“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是现时文学家、戏剧家们的通病。这种做法，“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__无疑，崇尚写实精神，就要勇于正视各种社会悲剧。由于反对“瞒”和“骗”的戏剧，坚守写实主义，胡适特别倡导悲剧的观念。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完满的团圆。”事实上，将生活中的悲剧惨剧写出来，就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举《红楼梦》的例子说：“例

如《石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这正是写实主义戏剧的力量所在，价值所在。

胡适现代戏剧观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方面，就是主张戏剧应对人的独立个性和精神加以表现。胡适赞扬易卜生生平“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这就是“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他引述易卜生给朋友勃兰兑斯的信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这里所谓“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所谓“救出自己”，引起许多学者误解与不满，觉得在新文化运动高涨的社会革命思潮中，胡适是在宣扬脱离社会的个人主义。有人认为“他之所以只能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而且越来越退到保守的地步”，就因为他鼓吹“为我主义”。“思想上笃信‘为我主义’只能使他钻进改良妥协的死胡同。”——也有人认为，“胡适把‘救出自己’和孟轲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混为一谈，后来又在《现代评论》杂志上借用易卜生的话，说学生闭户读书就是‘救出自己’，这就在理论和实践上模糊了‘救出自己’和‘利己主义’的界限，可见胡适还不是一个真实纯粹的易卜生主义者。”——

——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31 页

—— 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 7 期

—— 胡适：《引言》，《独立评论》创刊号

——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 31 号

—— 同上

__〔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8 页

__ 同上，第 92 页

__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41 页

__〔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0 页

__ 洪深：《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第 20 页

__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 页

__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 4 卷第 4 号

__，转引自胡德才：《现代中西戏剧关系的第一块里程碑》，《中国文化研究》1996 年秋之卷

__ 胡适：《我的信仰》，见《胡适自传》，黄山书社 1986 年版，第 96 页

__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31 页

__ 同上，第 736 页

__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6 页

__ 同上，第 56 页

__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42 页

__ 翟大炳：《论胡适的戏剧观》，《大庆师专学报》，1987 年第 1 期

__ 程致中：《论鲁迅胡适对易卜生戏剧的文化选择》，《学习与探索》1997 年，第 2 期